

青年视界·沈杏培主持

新大众文艺的理论溯源与现时观察

中国新文学诞生于内忧外患、民族危亡之际,因此,新文学自发轫之初,便内含着关切国族命运、回应社会现实的时代使命。20世纪以来,新文学以不同的文学变体和文学命名,回应着不同时期因时代发展而产生的文学增殖需求。透过文学变迁表象,深入新文学的内在发展理路,可以发现,中国新文学的核心讨论域,紧紧围绕人与文学的关系范畴展开。从文学维度来看,人与文学的关联问题,是指何种书写主体,书写何种文学,供何种对象阅读。从时代道路探索的深层结构来看,这个问题面向的是,个人以何种方式被组织起来,又如何生产出与之呼应的文学作品。概言之,中国新文学的阶段发展与20世纪中国的道路探索同频共振。

“五四”时期,随着“人的文学”的提出,文学家将个体意义上的人推至文学幕前,给予他们清晰的脸谱刻画。于是,乡曲小民不再是王朝统治下昏暗灰调的面孔背景板,而是作为一个个独立鲜活的生命个体在文学意义上被发现、被看见,进而成为可被启蒙、可被发掘的革命潜在动力。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个体将以何种方式参与新的共同体建构?这个问题辐射到文学领域,催生的文学命题则是,文学如何面向群体、面向大众、面向参与时代建设的大多数?晚清王朝土崩瓦解后,中国内部智识水平参差不齐、中外文明对照差异显著,数个世纪叠加在一起的时代眩晕感出现了。基于此社会现存情形,文学与大众的讨论逐步清晰聚焦为三个层面的问题:文学本身所标识的准入门槛是否意味着其只对精英阶层开放?知识分子能否代表大众发声?大众如何才能书写自己的文学?实际上,这些问题指向的是不同发展阶段均需考量的三重问题,即文学定位与教育普及问题、文学导向与国家建制问题、文学繁荣与创作主体问题。

于是,整个20世纪的文学实践,在兼顾中国内部现状、引入域外理论资源的情况下,一次次因地制宜、与时俱进,尝试对上述问题提出新的解决方案。当20世纪20年代主义争鸣时,《向导》上曾刊发读者来信《豆腐涨价与向导周报》,直指大众既无经济能力也无识字水平,理论普及只限于小范围的传播痛点。20世纪30年代,“左联”开展“文艺大众化”讨论,议题围绕“什么是文艺的大众化”“文艺应当如何实现大众化”展开,大众成为文艺服务的重要对象。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讲话中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中国的文艺发展方向敲下了一锤重音。

随着新媒介的蓬勃发展,新大众文艺成为当前重要的文学命题,承载着21世纪第三个十年的新文艺动向,其背后有着绵延不断的文学史脉络和一以贯之的人民主体定位。当下的文学创作者本就处于社会发展需求与文学生产现场交织而成的新文艺语境中,如此一来,置身其中的文学研究者将会产生何种新的文艺观察呢?本期文章尝试对此进行回应。

本期选刊的两篇文章,分别是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易圣凯和教授胡明贵合著的《从“群众性”到“人民性”——论新大众文艺的理论源流与命题演变》、南京大

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博士生汪韵霏的《情感形式、媒介转化与当代乡土想象的地域偏向——新大众文艺视野下〈缱绻与决绝〉的跨媒介改编》。

易圣凯和胡明贵从宏阔的视角,勾勒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大众化”命题在中国新文学思潮中的演变谱系。作者以开阔的视野,统筹理论原点与文学史双重脉络:一方面,文章重返马、恩经典文本理论语境,辨析“群众的活动”这一哲学命题何以根本性地重构了文艺的本质属性;另一方面,文章选取新文学发展历程中的重要节点,勾勒出从20世纪30年代“左联”“文艺大众化”讨论、20世纪40年代《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到20世纪50年代“双百方针”的时代思潮重心流变。在此基础上,作者将理论经典和文学发展予以对读,详细勾勒出从“群众性”到“人民性”的文艺观中国化历程。时至今日,“新大众文艺”概念的提出,旨在重申“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汪韵霏则以赵德发的小说《缱绻与决绝》到电视剧《生万物》的影视改编为切口,借助情感研究与媒介间性的理论视野,探究严肃文学在影视改编过程中如何生成新的影像语言与意义空间。在跨媒介转化过程中,文章先后考察《生万物》如何对“缱绻”与“决绝”这一情感结构进行影像重构与叙事阐发,如何建构起一个充盈着生命厚度与历史质感的乡土世界、打开一条理解现代中国乡土变迁的地方路径。值得思考的是,当大众消费和平台传播机制成为影视改编的重要影响因素时,如何选择性表述小说的意义空间、如何处理历史与当下的时空距离,成为文化工作者需要直面的新难题。

本期所组的两篇文章,实际上构成了一个历时轨迹、共时平面交汇而成的文学坐标系。当易圣凯、胡明贵以回溯的视角,在纷繁复杂的文学长河中剥离出一条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大众化”的明晰路径时,我们能够借助文学史经验,更为准确地锚定现有文学坐标,对文学来路有自觉的认知,而后对文学发展有自觉的建设。当我们将目光聚焦至现时现地的文学现场时,汪韵霏借助影视改编,在当下的共时场域中发现新大众文艺命题的更多可能面向。新媒介时代除了带来新的创作主体,其改编选材和荧幕呈现也影响着时人对于中国历史与当下的想象,如文章所提到的,如何突破既有影视改编的地域偏向,获得更为多元的“中国性”,也就成为可供思考的问题之一。两位青年学人共同聚焦于新大众文艺这一具有生命力和生长力的文学命题,在理论回溯和文学现场上各自着力,在历史考察和现实观察层面碰撞出多维思考空间。对于读者而言,我们可以在历史与现实的时间频道间自如切换,这种厚重又鲜活的文学感,也将帮助我们更好地思考文学的未来走向。